



青少年毛泽东的读书经

读《毛泽东年谱》有感

□杜正艾

源，动天下之心，谋国家富强，使愚人归于智，实现无比美好的大同世界。

毛泽东读书既注重学与思，也注重践与行。毛泽东读书，特别喜欢思考。他的老师黎锦熙在当年的日记中谈到他时讲：毛泽东“常独坐树下，疑思至晚，同住以为奇”。他喜欢抓住一个中心问题，集中精力专门研究。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毛泽东投笔从戎，支持革命。1912年2月，清帝退位，毛泽东认为革命已经结束，方退出军队，决定继续求学。为了改造社会、救国图强，毛泽东在一师时，掀起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参与学校校友会工作，创办夜学以求“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创立新民学会以图“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还特别重视游学，读“无字书”。1917年暑期，他和萧子升一起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1918年春，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了解各地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

毛泽东读书注重自学。他在第一中学读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文教师柳潜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他读得非常认真。读完后，认为学校课程有限，在校学习不如自学，遂退学自修，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半年中，他广泛研读西方18、19世纪资产阶级的哲学和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科学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严复翻译的著作，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比较系统深入地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在北大图书馆时，毛泽东利用工作之便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毛泽东后来多次回忆，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就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他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所说的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说，第一次看了这三本书，“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毛泽东读书好结良师益友。1915年6月25日，他在写给湘生的信中就谈到读书交友的重要性，他说：“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读私塾时，与主张维新的教师李漱清建立了师生和朋友关系。在一师时，与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老师建立了良好的师生关系，他们对毛泽东的学业和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还喜欢结交读书好友，重视交流互鉴，认为学问只有“用之而弥盛”。强调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少年时，他的表兄文运昌对他帮助很大。在一师时，在他身边，有许多志同道合者，蔡和森、陈昌、萧子升、熊光楚、李少青、周执钦、萧三等，交流读书笔记，切磋读书心得，探讨读书、治学之法，探求改造社会之道。

毛泽东读书特别讲求读书之法、科学之术。在一师时，他曾多次前往老师黎锦熙处探讨读书治学之法，不断修正错误，改进方法。毛泽东强调为学之道，应该日积月累，打好基础。他在为萧子升的读书札记《一切入一》所作的序中写道：“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一学”。认为做学问有如筑台，“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台积而高，学积而博”。青年毛泽东读书强调效率，注重精读。主张有些书以精读为主，深入研读，探其真谛，有的书则一般浏览，略知其义。“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徐特立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对毛泽东产生很深影响。毛泽东在四师、一师时积攒了许多读书笔记。其中有万余言的《讲堂录》，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诗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较多。细看所记所悟，可窥毛泽东读书之广、之精。精研细读的书，毛泽东都要把字弄清、把词弄清、把事弄清、把理弄清、把来龙去脉弄清，记住新鲜思想和观点，得出自己独立思考的结论。比如，毛泽东读清初诗人吴伟业的《雪中遇猎》一诗，全诗32句224字，毛泽东就在笔记本上记下注解21个。再如，毛泽东读《日记录序》，全篇不足900字，毛泽东将序言中列举的八个人物一一查明列出，并且研究各自的学术观点。恩师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是毛泽东很感兴趣的一本书，学得极为认真。他一度抄录了7本，还写下大量批注，表达自己的认识和领悟。

毛泽东读书特别关注时事。来到长沙以后，毛泽东就养成了阅读报纸杂志的习惯，阅读得最多的是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报纸。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当时鼓吹革命的《湘江新闻》，陈独秀主编的倡导新文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章士钊主编的“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的《甲寅》都是他关注的报刊。他在新军当列兵时，每月饷银大都用于购买报纸。在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购买阅读了大量报纸。到1927年上井冈山为止，他从来没有中断过，购书费用占了他生活中很大一部分支出。

悟道、明志、践行是青少年毛泽东的读书经，从毛泽东的读书经中，我们可以感悟到一个人为什么读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如何读书。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充实自己，更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世界，造福社会、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法治梦想照进现实

□封丽霞

放眼当今世界，“法治”乃是各国走向繁荣富强、公平正义的“不二法门”，是大国软实力的重要见证，亦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大潮流，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法治是什么？繁体的“灋”字，《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法治，就是用法律的准绳去衡量、规范、引导社会生活。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兴衰更替，历史早已明示，法治昌明方能国泰民安，法治废弛只会国乱民怨。依法治国是最可靠、最稳定的治理。

法治国家是中国的百年梦想

近代以来，古老的中华民族饱受外敌入侵的屈辱，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艰难窘境。在丧失“治外法权”等国家主权的深刻警醒之下，国人深刻认识到不讲变法就将坐以待毙，而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梁启超先生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孙中山希望把中国尽快建设成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立国于大地，不可无法也，立国于二十世纪文明竞进之秋，尤不可以无法”。

法治国家是中国的百年梦想。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缺乏建立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谱写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篇章，“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法治中国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我们党对法治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进行探索和实践，在瑞金、延安革命根据地，制定了宪法大纲、土地法等法律文件。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他率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从北京到了杭州，在西湖边，用了77个日夜，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的草案初稿。在去杭州的路上，毛泽东说，“治国，须有一部大法。我们这次去杭州，就是为了能集中精力做好这件立国安邦的大事”。

立良法是法治的起点

法治，是立国安邦的大事。而立良法，是法治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总体上实现了有法可依。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成就。

社会万象，纷繁复杂；立法所向，千头万绪。到底哪些才能成为立法的对象？我们进行立法，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各项要求，反映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与热切期待。

今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从国家土地制度，到百姓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家庭婚姻，每个公民都要接受这部法典的约束。通过对公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公序良俗的法治原则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为增进中国人民福祉点亮一盏明灯，也将成为衡量各级政府依法行政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标尺。

法治在细微处真正落地

法治不是机械的制度模型，也不是写在纸面上的苍白文字，它是“活的法律”。法治就像一架天平，一边是公共权力，一边是公民权利。在我国，大多数法律、法规和几乎所有的政府规章都是由各级政府执行。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让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运行，法治才能在细微处真正落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宏观层面的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多进步，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感知，必然会从宏观落脚到微观层面。个案是否公正，是普通中国人对法治最直观和最深切的评价标准。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叫《刘巧儿》。电影的法官“马专员”判案很有诀窍，他没有高坐厅堂、拒人千里，而是深入田间地头，与当事人拉家常，听老百姓诉苦，以公正判决赢得了人民的赞誉。他就是新中国法官的优秀代表马锡五，他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并载入新中国的司法史册。

此后，我国的司法体制机制经历了一轮又一轮改革，从司法民主到司法公开，从审判方式到职权配置，从司法责任制到法官官员额制，尽管具体的改革举措在变，但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让公平正义体现

在每一起具体案件中，体现在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中，是我们进行司法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法治力量深入人心

今天的中国，每一个公民都是法治中国的亲历者、推动者和受益者。只有人人尊崇法律、信仰法律，只有公民守法护法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法治力量才能深入人心，法治才能成为现实。1986年我国“一五”普法正式展开。春风化雨，润物无声。35年持续不断的普法教育，如同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我们今天的普法，是生动、真实、互动的。让执法、司法现场成为普法第一现场，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普法的常态。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当遇到问题的时候，老百姓不是靠直觉去被动应对，而是自觉运用理性去寻求法律途径的解决，这是全民守法不断深入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法治这一路走来，披荆斩棘、筚路蓝缕。今天，法治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国家到人民，从政府到社会，对于法治梦想的追寻，已经成为源于党心民意的深远共鸣，已成为值得倍加珍惜与呵护的社会共识。我们将不断续写中国法治这篇大文章。当法治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法律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呵护与保障，会让公民享有自由与尊严、免于匮乏与恐惧，会让温暖的法治之光绽放出坚毅的力量、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美好未来！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乐陵有棵母亲树

□王永武

五一假期，回山东德州老家看望年近九旬的老父亲。有着70年党龄的父亲向我提出一个想法，要我带他去位于乐陵的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补上自己因病住院治疗没能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史学习参观科目，更重要的是一拜祭常大大娘。

汽车行驶在冀鲁边区宽阔的马路上，道路两边郁郁葱葱的麦苗正在拔节孕穗，和风推动着麦浪；不时闪过的大片的金丝小枣树林正在伸展腰肢，生机勃勃地吐露嫩芽。少时参加儿童团、当过地下小交通员的父亲一路上向我讲述着当年抗战的历史。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由河北省津南地区的部分县与山东省北部的部分县合并形成的一个战略区——冀鲁边区。当年曾有“南有沂蒙山、北有冀鲁边”的说法。沂蒙山里有“红嫂”，冀鲁边有革命母亲“常大大娘”。

我们在参观了冀鲁边革命纪念馆，瞻仰了烈士碑林，拜祭了纪念广场上的英雄纪念碑和烈士墙后，来到常大娘之家展馆。

常大娘本名叫刘相会（也说刘香惠），1891年生于乐陵县三间堂乡刘玉亭村，因家境贫寒，9岁到常大村做了童养媳，丈夫常培仁是个聋哑人，她从小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虽然不识字，却十分明事理、有主见，也很坚强。

1938年，日本鬼子占领了乐陵一带，到处建据点修炮楼。为了开辟通道、扫清视线，在大徐家到乐陵城沿途30多里的地方大伐枣林，昔日茂密的枣树林成为几十万株伤痕累累的树桩子。那年秋天，八路军115师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在肖华的率领下开辟了以乐陵为中心的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刘相会那年47岁，她带着丈夫和6个孩子全家都加入抗战的队伍中，抗战军民都喊她“常大大娘”。

为了掩护八路军和边区干部战士，常大娘一家动手挖地道。常大娘在耳朵聋的老伴腰上拴条绳子，洞下装满土，拉一下绳子，他就把土筐拽上来。经过数月挖掘，终于挖成长约60米、高1.2米、宽80厘米的地道。常大娘家成了冀鲁边区三地委和靖远县的机关驻地。同志们来了，常大娘从不让他们饿着肚子，最多时她家一天做了17顿饭。

父亲说，当年冀鲁边八路军队伍里有一个暗语：“老槐树底下”，指的就是常大娘家。一天拂晓，腿部受伤的靖远县独立营副营长张子斌刚被送到常大娘家，就听到了日本鬼子和伪军进村的信号。常大娘不由分说把张副营长拽到炕上，顺手拉过一条被子，连头带脸把他蒙了个严实。伪军闯进来后，她谎称是自己的儿子发高烧

捂汗，骗过了追查。在常大娘的精心照顾下，10多天后张子斌痊愈归队。

常大娘对待每一名八路军战士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的战士伤得很重，常大娘没日没夜地守在他们身边，给他们擦洗身子，喂水喝药。渐渐地，来常大娘家养伤、开会、住宿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开始喊“大娘”，时间久了都改喊“娘”。这位革命母亲曾经掩护照顾过多少同志、伤员，没有人能说得清，经常会有自称儿子的人去看望她。晚年的常大娘一直念叨着他们，她坐在家中的土炕上，一口气能说出60多位同志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渤海区第一地委奖励她一面锦旗，向在抗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妈妈常大娘致敬！

参观完常大娘之家展馆，我和父亲却没有看到传说中的老槐树。打听展馆的工作人员，原来常大娘家门口并无什么老槐树，真正的“老槐树”其实就是常大娘。

静静地站在没有老槐树的大门前，我仿佛看到了一棵健壮伟岸的高大树木耸立在我眼前，她的生命力是那么顽强，从不惧风霜雨雪，支撑着枝繁叶茂的树冠，伫立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像伟大的母亲一样为人们遮风挡雨，她永远生长在人们的记忆里。